

##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琐谈

杨通儒(苗族)

在纪念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时候,回顾个人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还是很有意义的。

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属于历史民族学的范畴。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资料,除文献之外,主要来自田野调查。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除调查人员必须具备民族学的理论外,调查方法是一项很重要的手段。调查得当,资料可随手拈来,即使属于隐蔽的情节,也能察觉而设法问清;否则所得资料,只属一般现象,不够深邃,研究价值就相对降低。

笔者从1956年下半年原贵州、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时起,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止的十年中,几乎每年都作田野调查这项工作。一般是一年3至4个月,最长为半年,最短为半月(仅1962年)。综合调查点计9个,单项调查计4个。其中有数人合作的,也有个人单独“作战”的。调查过程中,遇见不少问题和困难。现作回顾综述,向建所30周年敬献一点纪念。

### (一)入乡问俗,以诚待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习俗,也有许多忌讳,连欧美科学发达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至今还保存与科学相背的一些忌讳,如认为某些数字不吉祥等。相比之下,贵州省科学、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忌讳更多。这些忌讳有纯属迷信的禁忌,也有属于礼貌、礼节的忌讳。无论调查任何民族,都要与群众接触,所以下车伊始,先要了解一下当地群众最忌讳的一些习俗,随时注意,不要触犯;否则给被访问人不好的印象后,对开展调查工作带来许多难处,甚至对方不愿详谈。

属于礼貌、礼节的忌讳,如年轻人不能在老年人面前跷脚,说话要尊重对方,遇上人家办喜事时,不要当面说一些“不吉利”的话等。有一些民族的青年姑娘和中、老年妇女吸烟的较多,抽烟时如有她们在场,不要忘记敬烟,否则将被认为是看不起她们。有的民族成年人,无论男女,如在他们面前放“虚恭”,会被认为是对他们不尊重而产生恶感。若疏忽这些礼俗,将影响到资料搜集的深度和广度。

习俗中属于迷信的禁忌较多。对这类禁忌也要尊重。尊重迷信禁忌,不是默认迷信,但不要表现在神态上。如黔东南的大部份苗族,每在攘鬼后,要禁忌三朝不许外人进家。禁忌标志是在门外树一小棍,高约1米,上挽草标,表示忌家(期满拆除)。遇上这种人家,不要走访,就可达到既不触犯,也不显出尊重迷信禁忌的神态了。

对于访问对象,无论中年、老年,男的、女的,要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不要显示

特殊,以使他们乐于接近,愿意摆谈。入村几天后,也可能有人来要求解决一些纠纷问题。他们常常认为省里来的干部会帮助解决的,寄以很大的希望。遇上这种情况,可以让他讲完,再按情况,告诉他去找村干或乡政府解决。1958年10月,笔者到凯里县(现为市)舟溪公社的甘超苗寨调查。适值大跃进时期,有一位苗族老嫗来找,要求在自己房头空地栽蔬菜。当时人民公社刚成立,自留地如何处理还没有规定。她讲完后,笔者告诉她去找原农业合作社主任解决,她终于去了。“文革”前到农村调查,经常遇上类似事情。自己虽无权处理,但可为他们分忧,也不要使他们感到难堪。

## (二)用语通俗,先易后难

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要深入民族农村,访问的对象基本上是农民。他们多不识字,甚至不谙汉语。因此,在访问时,语言要尽量通俗;如还不懂,应多解释,不要用学术上的词汇或语气去问。否则他们越听越不懂,无所适从,甚至“敬而远之”,不愿再谈了。如不谙民族语言而请人翻译时,要防止翻译者擅将少数民族的一些东西——如古代人名乱套上汉族的古代人名。黔东南苗族上古一位很有名的领袖固央,有人曾将他译成了张果老。张果老、张三丰、杨六郎等汉族古人的名字,在贵州的少数民族中流行面宽,调查传说故事时,常把他们说是某民族古代的某人,这就错了。

访问的内容,须从易起,再及难处。所谓易、难,是指访问内容的一般情况或偏僻、隐讳的地方。一般情况易讲,偏僻、隐讳难问。开头即问隐讳、偏僻的情况,被访问人可能会有顾忌而佯装不知,所以要先从他们易于说出的内容谈起,经过一段时间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后再问及难处,就较易于解决。如1957年笔者在台江调查苗族的原始宗教时;请到一位70多岁的老巫师讲述。事先考虑内容有两处可能他不愿讲:一是以三片芭茅草占卜就能知道何鬼为祟的“奥妙”;二是认为可置人于死地的“恶鬼”。因此,将两者放到最后,先从一般谈起。在请他讲述的一个多月中,笔者以老辈看待他,并关心他的生活,相处得很好。最后问到卜鬼方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讲述,这是笔者事先估计错了。但当问到最恶的鬼时,他仍表示为难;经一再启发,并同意他提的条件后,他才愿意讲述,将很长的巫词从头念起,得以当场翻译、纪录。

事先不考虑易、难,开口即问,就要被拒绝。如1982年笔者去紫云调查一个布依族聚居村寨,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事先未作考虑,开头即问当地布依族妇女易裙为裤大致始于何时,他回答说:“从古以来都不穿裙”,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是不愿意讲,可能是认为穿裙是落后的装束而隐讳。但笔者事先查阅志书,知道布依族妇女改裙为裤以独山一带为最早,始于乾隆年间。而与紫云为邻的罗甸、惠水等县,经调查得知是在民国初期才开始改装,紫云不会早于此时。他既避而不谈,不便再问,改谈其他。几小时后,才以独山、罗甸、惠水等县改装的时间和情况,并以古代汉族妇女平时也普遍穿裙,后来才逐渐改裙为裤等例作启发,他终于谈出是在民国初期改变的,解放后,老年妇女仍制衣裙为“寿衣”,备作去世时穿用。

田野调查的访问对象,以阅历多的中、老年人为恰当。但60岁左右以上的老年人,一般还要劳动。访问他们,要体贴和照顾他们的休息。如昼间劳动整天,晚上去找就要事先征得他们同意。1965年笔者到黄平县枫塘公社调查侗家月余,先请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座谈。两天后的一天,笔者跟随社员下田插秧,不知道他也在别处劳动。晚上到他家时,看见他似

有些疲惫，他直接了当地说：你应去找年轻点的人座谈吧。于是向他致歉辞出，并连速几天不再找他。后来他仍约去座谈。但他年事已高，不便长谈，只作礼节性拜访，请他核对资料，每次都不超一小时。这样，我们始终保持和协的关系，搜集到丰富而真实的材料。

### （三）关键之处，详询含义

社会历史调查是为了研究，因此，每遇重要的地方、情节和重要活动的表演含义，即使属于迷信，也要问清。必要时，要多问几人，以求得正确的解释，才便于分析研究。调查农业生产或生活习俗以及其他，都常遇到必须进一步问清之处。如黔东南一些地区的苗族结婚，新娘进夫家时，必须先跨左脚，不要先跨右脚。主要送亲的一位中年妇女，一定要随同新娘。新娘入室后“掐（撕）鱼祭祖”，须用鲤鱼。先跨左脚，是希望先生男孩；用鲤鱼祭祖，因其卵多，预兆以后她多子多孙。从这些行动的含义中，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看法：这部份苗族的重男轻女思想，程度很深。又一些地区的苗族结婚，当新娘和送亲人离女方村寨时，必由一位老嫗殿后。她手捧一只圆形小饭箩盖，将盖内所盛的一小团糯米饭食毕，即以箩盖向新娘走去的方向连滚数次于路面，口中念念有词。这是祝愿姑娘成了夫家的人后，不要三心二意，不要逃婚。得知这一表演的含义后，就可进一步询问历史上的缔结婚姻情况。原来这部份苗族在民国中期以前，包办婚姻严重，常为当事人所反对。反对者如属女方，正面她不敢抗议，常在举行结婚仪式后不久，即暗中随情人潜逃。为父母的，怕出事连累，便采用这种可笑的方法来祈求祖先庇佑，不要出现逃婚。

黔东南苗族丧葬习俗中忌用铜、铁、锡等金属殉葬，除个别地方用小型铁质农具殉葬外，其余各地普遍忌用，更忌用铜。一般用一点碎银殉葬，也怕银中掺铜，要请银匠提炼成纯银而后用。明乎此，修黔桂铁路时，于麻江境内谷硐车站发现的古墓，以铜鼓殉葬（考古学者将铜鼓命名为“麻江型”），墓中死者的民族成份，就可排除苗族。所以在调查时对于许多现象或活动的含义问清了，在研究时，就可提出看法，甚至可下结论。

### （四）全面调查，追溯历史

这里说的全面，是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包括农业、饲养、手工、运输、商贩等；上层建筑包括生活习俗、宗教信仰、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教育医药、传说故事、歌词谜语等等。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就有时间从事各种创造，上层建筑便出现丰富多彩的内容，精致美观的成品。经济落后，人们为生活而终日忙碌，无暇顾及其他，上层建筑方面的东西也就相应粗糙、简单。例如黔东南苗族妇女的刺绣、织锦，比较有名；佩带银饰数量之大，常为世人惊叹。但这只是清水江、潯阳河两岸和海拔较低、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两河可通舟楫，生猪、皮张、木材等，常以船运和原木扎筏顺江而下出省销售；农业都是一年两熟，比较富裕。明代文献已有关于刺绣、织锦、银饰的记载，清代记载更多且详，民国年间刺绣、织锦、银饰，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远离两河无航运之便的台江、剑河南部，榕江的八开，从江的加鸠、宰便等苗族聚居地区，土特产品输出困难，且海拔高而气温低，农业年仅一熟，经济贫困，因而妇女以刺绣为衣饰的部位很小，甚至没有；以银为饰也很有限。但这不是这些地区的姑娘愚笨，如台江县南部高寒地区巫脚乡的苗族姑娘织锦（约两寸宽的长带），却很精致美观。只是为了生活，终日忙于农事，无暇顾及为了美化而绣花。这些例证，说明上层建筑方面文化的优劣，都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程度。所以调查社会历史时，须要两者兼顾，才更具有研究价值。

社会历史,既研究现状,也研究历史的变化。现状是由历史演变而来,有的还保持历史原样较多。问了现状,不要忘记追溯历史。例如雷山妇女易裙为裤始于何时,无文献记载。1964年笔者到雷山调查时问及此事。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民国八年从西江开始,几年间同一服装式样的苗族,各地都改变了。民国八年(1919年)到1964年,相距40多年,当时口述者已20来岁,亲眼看见,应当相信。

又如苗族的丧葬,从前有一部份盛行岩棺葬,另一部份却用横埋。部份地区的布依族在清代中叶以前,普遍实行二次葬,以后逐渐改为一次棺葬。调查时如不追溯历史,只从文献看到,就不清楚哪部份苗族原用岩棺葬,哪部份用横埋,何时何故改为土葬和顺葬。布依族的二次葬改为一次棺葬的时期和原因,也都要问清。这对民族历史研究,有直接的价值。

### (五)就地整理,核对补充

社会历史资料,无论是全面搜集或单项调查,都不可能一次访问就记录无遗而达到深度,还需多次补充核对。最好是就地整理素材,如时间不允许,也要将纪录的卡片详阅一遍,发现纪录不全、前后矛盾、含义不明时,立即核对、更正、补充。如调查黔东和川黔滇两方言的苗族时,还要问清同这里服饰一样的分布地区;因为服饰相同,上层建筑基本一样。问清了,就知道这份资料的代表面。

1962年春节,花溪区桐木岭苗族跳场,笔者前往调查。在场上访问和目睹,只得到起源传说和跳场现象,经详细阅读纪录卡片后,感到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补充。于是在跳场结束后,又到花溪公社苗族聚居的关口访问(与桐木岭跳场同支系),知道这支苗族分布在惠水、长顺、安顺、平坝数县和花溪区接壤一带,以居住在花溪区境内的人口最多。跳场形式是男青年吹奏芦笙沿场边走在前,几个姑娘同时各以长布带插于男青年腰带上,手牵另一端随后共同绕场,俗称“牵羊”,这是现场看到的。但“牵羊”的双方,事先是否认识,过后是否会建立情谊?经再次调查才知道:绕场前,须由女方母亲或姐姐征得男青年同意。过后,男青年应姑娘之约,前往她家作客。此后互相来往,有的长达数年,然后男家央媒前往说亲。婚后感情融洽,较之父母包办而强行结合,不可同日而语。又,桐木岭的跳场,是由孟关的唐姓苗族主持,唐姓祖先曾置田业,每年以其收益招待远来参加跳场活动的苗族食用。这份产业直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才改变所有权。这都是再度入村调查才搜集到的资料。后来发现抗战期间迁来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和五十年代初原贵州民族学院的调查资料,都没有搜集到这些资料。这是是否再次深入调查的不同结果。

※ ※ ※

贵州的少数民族,多无文字,无法把本民族的历史记录下来。汉文虽有零星记载,但用以研究民族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调查社会历史资料来弥补。社会历史资料,要加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取得真实可靠的史料。

社会历史调查,既要追溯历史,也要问清现状。对于历史传统还要做一番鉴别工作。对于优良传统要继续发扬,但对那些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甚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习俗,要加以改革。如操苗语黔东和川黔滇两方言的苗族,目前许多地方近亲结婚很普遍,影响下一代的体质和智力,甚至出现不少的痴呆和聋哑儿童,对社会发展很不利。还有结婚时,男家须付女家聘资和几个至亲的礼钱,大半人家都在千元以上,还有大宴宾客也多超千元,还有其他开支,总计在二、三千元以上。这样浩大的开支,已大大超过一般人家的负荷能力。这对致

# 彝族诗学的经典论著

## ——评《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

沈嘉泽

1988年,《彝族诗文论》和《论彝诗体例》两部彝族诗学经典译著相继问世,这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学发掘研究的又一成果。翻译整理这两部彝族诗文手抄本的康健、何积全、王子尧、王洽新同志,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十分可贵的。

我国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勤劳智慧的民族,由于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才使得把丰富的彝文经典保存流传下来,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彝族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先后发现、翻译整理出版了彝族创世纪史诗、长篇叙事诗、抒情诗多种,如《阿细的先基》、《阿诗玛》、《梅葛》、《查姆》、《勒鸟特依》、《洪水记》、《彝族史诗》等,光彩璀灿,让人们真感到彝族是一个诗的王国。《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正是在这个“诗国”土壤里产生的彝诗学经典。它概括和总结了本民族诗文创作的经验、规律、技巧,又以它指导本民族诗文的创作。所以,彝族两部诗学的发现、翻译整理,不但填补了彝族文学理论的空白,同时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诗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大约一千多年以前,彝族就有了自己的由举奢哲为代表的经师、史家、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和著名女诗人、诗歌理论家阿买妮。之后的五、六百年间,又出现了著名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布麦阿钮。据《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翻译整理者考证,根据彝族父子连名制,在贵州毕节地区发现了“盐仓”家谱,“盐仓家”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从中获知,举奢哲、阿买妮是从清康熙三年算起往上推66代时候的人,相当于魏晋南北朝到唐这一时期。布麦阿钮晚于举奢哲、阿买妮五、六百年,相当于两宋时期的人。这样看来,两部诗学产生的历史跨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了彝族古代独立的诗学体系。

举奢哲建立了彝族诗文理论,阿买妮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对彝语诗律理论作出了贡献。布麦阿钮又承前启后,对彝语诗律、诗歌体例理论作了更为透辟详细的论述。两部诗学理论中可多处见到,阿买妮和布麦阿钮等都推崇举奢哲为典范,常以举奢哲理论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如阿买妮引述说:“举奢哲说过:每个写作者,在写诗歌时,声韵要讲究,人富脱贫是一个大矛盾。对这些作了调查研究之后,可以向政府提供施政参考。”

以上琐谈,仅是个人调查的一点经验教训,作为调查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责编 云青)